

守正与融通：清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重构及其批评史意义

张莹洁 马茂军

【摘要】清人所编古文选本虽体例不尽相同，但普遍以古文为因时而变、创新发展的动态概念，并于古文的道统观念、发展纲要、文体关系、审美属性多有前人未及、深刻独到的探本之说。清代古文选家一改明代偏于性灵抒发、消解意识形态的选文陈轨，通过编纂实践活动赋予古文不失正统而又不拘一律的精神品格，不仅蕴涵着赓续古文运动正统文风、标示文章发展脉络的要义宏旨，又不乏文体互通借鉴、审美思想的深度揭示。质言之，清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兼有理论色彩与实践指向的重构，使之生成守正与融通两大特质，选本的学理性、审美性、实用性也随之提升，反映出文用实践认知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清代；古文选本；古文观念；批评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5)02-0207-13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古文观念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衍变。唐前古文多指古文字及古文献，并无文体的意义，只有到了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以后，以儒学为核心思想、宗周秦两汉流畅达文风的古文文体才真正形成，并与六朝盛行的骈俪文成对垒之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在完成文笔之辨向诗文之辨转型的宋代，古文研究与批评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文章创作逐渐以散体文为主导，不再局限于诗赋、骈文的范畴，古文在理论与创作两个层面均得以确立。^①明代古文选本的编纂盛况又为古文观念的发展带来契机，不囿于道统、注重个体情感抒发之作风靡一时。“明代的古文审美观，与意识形态关系复杂，有与之一致的‘古雅’审美，也有淡化乃至消解意识形态的新奇审美观，后者最具时代特色。”^②对古文

【作者简介】张莹洁，暨南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2；

马茂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究”（17ZDA24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2023M741393）；“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0976）；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资助项目”（WHW201809）

①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写道，“唐宋古文运动倡导者都自称所作散文为‘古文’，或亦径称‘文’、‘文章’。于是有韵之‘诗’可以不再包括在‘文’、‘文章’之内，而是与‘文’、‘文章’并列了。”（详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而魏晋南北朝至初盛唐时期，文坛以诗赋、骈文创作为中心，“文”与“文章”是博杂无依、包罗万有的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古文并不一致。唐宋时期古文选本编纂数量相对后世较少，“文”一般是指与“诗”对举的“古文”，诗、文二者泾渭分明，相关研究往往以文话、文论为主，较少从古文选本抽绎古文观念。

② 郑天熙：《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探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第632页。

的界说往往突破传统认知,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追求。不可否认,不同时代的古文观念均深受主观定义与时代文化的影响,恰如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一文所言,“(古文)在文体学上具有开放性、含糊性和有弹性内涵的特色”^①,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古文观念的时代感和多元性。当前,学界对清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关注较少,这一领域的研究亟待深入。清代古文选本的选文、序言、凡例、评点等要素究竟如何体现古文观念的重构?其意义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自有其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本文全面梳理相关文献,以时代为线索,旨在诠释清代古文选本中古文观念的重构,涵盖古文之重道精神、发展纲要、文体关系、审美属性四个主要维度,以期系统地把握清人的选学理念,形成古文观念在清代选本中特有面貌的整体认知,并揭示其所蕴含的批评史意义,为文章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重回古典主义:古文的明道观念复归

从宋代到清代,古文选本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所承载的古文观念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宋代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或讲文章,或重理学,皆以古文为圣道的体现。然而,明人对此进行消解颠覆,面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论、公安与竟陵派的唯情论,以及王学左派所倡导的人文解放思潮,选家极力主张古文应具备消遣功能,《文娱》《古今小品》《古文小品冰雪携》等古文选本标榜独特的审美情趣,张扬主体的个性特征,构建出极富明代特色、远离教化的古文观念。时代的巨变促使学者深刻反思明朝的覆灭,吴应箕曾发出“今之人又取韩欧所扫除六朝、五代之古以为古,而反以唐宋为卑”^②的慨叹,而吴伟业亦有“恨后生不见古人之大全”^③的怅言,既将社会变乱归因于道统之衰,又批判了明中晚期以来反韩欧古文带来的道弊文丧。清初以来,社会渐趋安定,统治者尚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再兴,古文选家顺应官方意识形态,对古文与“道”之关系作出了前代选者未有的深入思考与精当表述。面对明人选本对古文载道理念的反动,清人意图回归古典,重拾古文运动的文学理念,构建以明道为精神底色的古文观念。

第一,清代古文选本强调文以明道,认为古文主要是用来阐发思想和道理的,纠正明人偏离唐宋古文运动精神的选学观。清代敕修选本《古文渊鉴》认为“文者,载道之器”,“词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是选文主体,瑰丽之篇也须“归于古雅”^④,所录诸子文、六朝文亦“无一篇逸出‘六籍’之旨”。^⑤《御选唐宋文醇》与之类似,也以言之有物为衡文准绳,“以能根柢经史者为上”^⑥,为选韩愈在内的多位古文家作品“犹且十未三四”^⑦感到遗憾。统治者尊奉程朱理学,对古文选本改变前代选风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选家选文翕然宗之,肯定谈理论道之文的主导地位,尤其倾向先秦经史、汉代贾谊、司马相如与唐宋八家的政论,宋文也欣赏程朱理学一脉者之作。放眼整个清代,反对载道的古文选本仅王复礼《古文未曾有集》一种,该集专选“巧思云涌,翻空出奇”^⑧的游戏文章,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二十四日奏准禁毁”^⑨,主要沿袭晚明古文观念,成为清代选本中极为罕见的一例。

在文以明道的古文观指导下,思想性成了清人核定文章价值的重要维度。吴震方《朱子论定文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书仅收录朱熹所论定的文章,视之为后学关键,指出选本“非选古文”^⑩,以古文为载体传递朱熹评定古文的道学观。蔡世远《古文雅正》不录与修身经世无关的文章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专注“合辞命、议论、论事,而一贯穿于理者”^⑪,展现古文在发扬道统、指导实践方面的价值。

① 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② 吴应箕:《吴应箕文集》,章建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265页。

③ 蒋铭编:《古文汇钞》,康熙五年(1666)卓观堂10卷本,吴伟业序,第4页b。

④ 爱新觉罗·玄烨选,徐乾学等编:《御选古文渊鉴》,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64卷本,康熙序,第1、5—6、6页。

⑤ 郑凯歌:《论〈古文渊鉴〉体制“权舆于六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

⑥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7页。

⑦ 爱新觉罗·弘历选:《御选唐宋文醇》,允禄等编,乾隆三年(1738)武英殿58卷本,乾隆序,第3页a。

⑧ 王复礼编:《古文未曾有集》,康熙十九年(1680)隆道堂刻8卷本,王复礼序,第2页a。

⑨ 王彬:《清代禁书总述》,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第442页。

⑩ 吴震方编:《朱子论定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凡例,第5页。

⑪ 蔡世远编:《古文雅正》,雍正三年(1725)念修堂14卷本,张廷玉序,第3页b—4页a。

陆燿《切问斋文钞》也强调选文的思想性，即便瑰辞丽句工巧至极，“概以无用不录”^①，引导读者关注文章的实际效用与内涵。最为直接的是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选》一书，该书将文章分为有道、无道两种，并宣称只有前者才能称之为古文：

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而离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韩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书，何其不自重也。子厚失身遭贬，而悲蹙之意形于文墨。欧阳子长于论事，而言理则浅。曾南丰论学虽精，而本原未彻。至于王氏坚僻自用，苏氏好言权术，而子瞻、子由出入于仪、秦、老、佛之余，此数公者，其离合醇疵，各有分数。^②

立足道本位以分析古文离合醇疵，褒扬合道而醇者，反对离道而疵者，对理醇辞雅、规矩严密的曾巩文青眼有加，给出了与圣人经籍异轨合辙、有羽翼程朱理学之功的评价，“视欧阳庐陵，几欲轶而过之，苏氏父子远不如也”。^③明中叶以来选家不重养气修德，鲜合乎道，清代选家则对离道而选空文的现象予以批判，反映其对古文本质的理解，与官方选学思想桴鼓相应。

第二，清代古文选家主张文从道出，认为古文由道理自发派生，道为文之本源，文为道之支流，与明人追求个人情趣、否定文道关联的理念有根本区别，极具针对性。任何优秀的古文都是作者深厚思想、学养的自然流露，过珙《古文觉斯》序就说古文可传而不朽者“亦道所由，寓文章中之百川众壑、殊涂同归者也”^④，谢有焯《古文赏音》序也说古之作者“道弻于中而裸之以艺”^⑤，为《四书》《五经》以来的秦、汉、唐、宋、元、明大家之文无不由道而生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应的，古文创作在清代选家眼中是一个沿波讨源、由文体道的过程。他们认为，创作者应加强个人修养，以六经、程朱理学为旨归，先义后法，进而理解《左》《国》《史》《汉》而为唐宋大家等一系列发展变化的行文之术：

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⑥

始而诵其文，既而穷其理。……盖涵濡之久而觉我之心无不可，于古人相通者，即古人之心。^⑦
道弻于中，而辞以宣之，琅然有声，炳然有色。^⑧

法必本夫人。……如是古之必求入夫人之心，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⑨

也就是说，作为“艺”之一的古文只是“道”本体的文字呈现。因此，学习古文一是应“尚友”，通过作者人格接受提升创作主体内在涵养；二是讲求写作技巧而不废道，圣贤义理的融会贯通是作品有义法光华、远离鄙俗无当的根本原因。清代选家关于道本文末、道源文流有清晰的认知，认同韩、柳、欧等古文家人品、文品统一的批评原则，与明代部分选家视古文为情感宣泄的产物判然有别。

第三，清代古文选家在选本中阐明何者为道，指出“道”非玄远难及之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日常事物之中，合乎儒家文艺思想下形成的切于身、达于用的古文观，弥补了前代古文选本对有道之文界定的阙如。清代早期古文选家就已经通过选本诠释道不远人，大而军国之经纶、迩而身心之准则皆是道之所存：

以圣贤之道为的，大者刚（纲）常伦纪，小者日用事物。^⑩

一切忠孝义节及经济，有关国家兴亡、风俗凉厚者，必拈出另评，非穿凿也，窃欲随事寓箴，以为人心之小补云尔。^⑪

① 陆燿编：《切问斋文钞》，乾隆四十年（1775）吴江陆氏30卷本，陆燿例言，第2页a。

② 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文选》，康熙四十八年（1709）福州正谊书院19卷本，张伯行序，第2页b—3页a。

③ 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文选》，曾文引，第2页。

④ 过珙编：《详订古文觉斯》，康熙十一年（1672）绍闻堂10卷本，过珙序，第1—2页。

⑤ 谢有焯编：《古文赏音》，康熙四十六年（1707）师俭阁12卷本，谢有焯序，第1页a。

⑥ 方苞编：《古文约选》，雍正十一年（1733）和硕果亲王府不分卷本，方苞序，第5页a。

⑦ 孙琮编：《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康熙二十年（1681）养正堂32卷本，孙琮序，第4页a。

⑧ 潘大弼、倪承茂编：《古文约编》，乾隆五年（1740）清芬书屋10卷本，倪承茂序，第1页b。

⑨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页。

⑩ 冯心友编：《古文汇编》，康熙四十四年（1705）正谊堂12卷本，张恕可序，第3页a。

⑪ 冯心友编：《古文汇编》，冯心友凡例，第1页b—2页a。

忠孝义烈大节及时务经济关系于国家兴亡，或小题中立意正大者，方汇入选。^①

从纲常伦纪到日用事物，只要能正人心、厚风俗者即为合道。他们以儒学为要，说明古文是否合道不在于主题大小，而在于能否阐扬经书义理，有功于世道人心，体现了古文选本对文章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尤为需要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以后，以宋学义理为旨归的古文选本表现出更为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譬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西湖寄生《国朝文警初编》、胡嘉铨《国朝文栋》、王壘《国朝文述》等选本皆有感现实，要通过选文扶世翼教，其中《国朝文述》归纳合道之文有“阐道”（天人性命之奥）、“明伦”（忠孝节义之端）、“经世”（礼乐刑政之原）、“纪事论人”（褒贬劝惩之义）、“考典”（著作掌故之事）、“游艺”（有资格物，有益于世道人心）^②七种，对古文“道”在文章中的主要题材内容作出较为全面的归类。总体看来，清代选本的古文观念既符合朱子文道观，又加强了古文在伦理道德、社会导向方面的意义，将选文与修身、义理、政治、国运紧密联系，这不仅是文学思想回归正轨以实现复兴儒道的途径之一，更是新形势下为选本发展增添动力的迫切需求。清代选家对文以明道、文从道出、何者为道进行阐释，客观上也结束明人文统、道统论争，不再延续文章家、理学家对峙的局面，以新风开启新世风。如此一来，清代古文选本整体的精神底色就与明代张扬个性迥异，义为道，法为文，在义法并未割裂这一点上具有鲜明的辨识度，重新确立了古文观念当合乎明道精神的第一要义。

二、考镜源流与明确重心：古文的发展纲要概览

宋代古文选本的理念大多厚今薄古，《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古文集成》基于唐宋之文体类明确、技法易学的特点，以服务于科举为目的，重唐宋而轻秦汉，不免忽略古文发展史的整体考察。^③明代专题类古文选本或推唐宋，或标秦汉，或尚性灵，惟少数通代型古文选本有古文发展观，可惜持论偏颇，认为文体代降，如林希元《古文类抄》序指出文会随时代发展而衰，“万劫递历，久则渐薄，不能及于前”^④，又如穆文熙《文浦玄珠》序认为唐文尚比偶、宋文格调卑，“俾得与秦汉同价值”^⑤，皆少录唐宋以下文字，再如凌云翼《历代文选》凡例说上古文风浑涵醇厚，东汉以后则去古甚远，“去取不得不严”。^⑥简言之，明代有的选家认为唐宋文不能与秦汉文价值相当，古文发展是一个由醇厚、质朴、典雅走向浇薄、离散、卑弱的过程。

与前代相较，清代古文选本特征之一是对古文发展谱系有自觉的建构意识，基于道统精神审视秦汉、唐宋文，认为它们构成了儒家传道的主要脉络和谱系，故而予以肯定，以此反击明人消极的古文发展观。一方面，清早期选家论述古文源头最详，一种观点指出古文源于先秦辞令，蒋铭《古文汇钞》之吴伟业序曰：

先儒谓三代无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产、叔向用文词为功，而庄周、列御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时为古文尚书、古文孝经者，以六书难字为考证而已，初非以至文名之也。^⑦

孙琮《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序曰：

夫古者辞令简质，载籍未繁。尼山至圣观书周室，始得读柱下遗编；韩宣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吴公子聘上国，然后闻《诗》之风雅颂。至《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读之者则惟左史倚相，特显名当世。自微言既绝，诸子百家簧鼓争鸣。^⑧

① 林云铭编：《古文析义》，康熙五十五年（1716）文选楼16卷本，林云铭凡例，第1页a。

② 王壘编：《国朝文述》，道光二十三年（1843）艺海堂8卷本，王壘序，第1页b。

③ 《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古文集成》虽皆为通代型古文选本，但其编选观念更重视唐宋文。《古文关键》不选秦汉古文，倾向苏轼和韩愈，分别选入16篇和13篇；《崇古文诀》以唐宋文为主，韩愈、欧阳修选文最多，分别选入25篇和18篇；《古文集成》按文体分类，其中宋文占多数，尤重朱熹和杨万里，分别选入44篇和33篇。这些选本改变了唐人重视秦汉古文的传统，为明代唐宋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也有少数选本仅收秦汉而不及唐宋，其典型为真德秀《文章正宗》，“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选录较多者有《左传》153篇与《两汉诏册》152篇，遥启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论。其所选各有时代约限，对古文发展脉络的呈现不够完整。

④ 林希元：《林次厓先生文集》，林海权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82页。

⑤ 穆文熙编：《文浦玄珠》，万历八年（1580）临江敷氏建州6卷本，穆文熙序，第4页b。

⑥ 凌云翼编：《历代文选》，隆庆六年（1572）胡广郟阳知府杨愈茂刊14卷本，凡例，第1页a。

⑦ 蒋铭编：《古文汇钞》，吴伟业序，第1页b—2页a。

⑧ 孙琮编：《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孙琮序，第1页a。

吴伟业指出古文源于先秦，有以子产、叔向为代表的侧重实用的治国之辞与以庄子、列子为代表的侧重审美的哲理之辞，两汉古文承其余绪故兼具实用功能与审美特征。孙琮也认为古文初始形态为辞令，有《道德经》《周易》《春秋》《诗经》《三坟》《五典》等可考，多为口述言辞，涵盖外交场合的应对语言。另一种观点也认为古文源于先秦，主要代表为儒典，康熙《古文渊鉴》序曰：

书契以后，作者代兴，载籍充盈，体制不一。约而论之，靡不根抵于群经，权輿于六籍。^①

钱肃润《文澱初编》序曰：

文之源，始于六经，而徒及于《史》《汉》，及于六朝，及于唐宋诸大家，其流有不尽出于源者乎？故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②

前者以官方立场奠群经为文章体制源头论，“群经”“六籍”乃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书。^③后者持重源说论断古文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六经既为文之渊源应被推重，本立则文生。无论是辞令，抑或是儒典，皆说明清代古文选家认真考察古文发轫，置先秦文为文统序列首位，有别于明代选本唯情论倾向而转向崇经，强调编纂古文与创作古文的取范重点，在给予六经至高地位的基础上开辟新时期古文选本与创作之宗尚。

另一方面，清代古文选本梳理古文发展史，明确古文发展的重心，间接反对明人某些选本中存在的代降说。先说最浅显的选文层面情况。一是清代通代型古文选本有一个民间最为流行的范本《古文观止》，选目比例就能反映出融合秦汉、唐宋的倾向。^④二是清代早期古文选本就已经形成了秦汉文、唐宋文占主流的局面，此后许多有影响力的本子也以先秦两汉及唐宋的经典文章为古文正宗：梅曾亮《古文词略》选文较姚鼐《古文辞类纂》更为精简，秦汉、唐宋之文并重；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重唐宋八家文，尤宗韩欧，先秦两汉文篇目不亚于唐宋文；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补充《古文辞类纂》中秦汉文选篇的不足，使唐宋八家文的数目不逊于先秦两汉文；吴汝纶《古文读本》、吴闿生《古文范》也多选先秦两汉文，使之与唐宋文等量齐观，不拘执于某一时期的藩篱。^⑤

再说选本中与之相符的文章批评。首先，清代古文选家指出，学习唐宋文与秦汉文是摆脱道弊文丧的有效手段，再现昌黎起八代之衰、庐陵变五季之弊的文学史定评，标示秦汉、唐宋与秾艳无理之文分道扬镳，自是杰构，洵属古文发展史重心：

自魏晋六朝工于四六骈俪，唐宋巨儒始为黜浮崇雅之学，将力挽斯世之颓靡，而轨之于正。^⑥

绮于魏晋，滥于陈隋，佻薄倣诡于唐之五季，非韩欧诸子崛起其间，古文一线几何不渐灭尽也。^⑦

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⑧

六季之绮靡而极矣。韩文公深探元本，推司马迁、相如、董生、刘向之徒为文章模范，其所著

① 爱新觉罗·玄烨选：《御选古文渊鉴》，徐乾学等编，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64卷本，康熙序，第1页b—2页a。

② 钱肃润：《文澱初编》，康熙二十年（1681）钱氏十峰草堂20卷本，钱肃润序，第5页b—6页a。

③ 学界一般认为“六籍”与“群经”同义，泛指儒家经典典籍，“《序》中所言“群经”只是一个模糊所指的概念，强调的是‘经’，而不是哪部，或者哪些‘经’”（可参考郑凯歌《论〈古文渊鉴〉体制“权輿于六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第82页）。

④ 《古文观止》先秦文73篇，占32.88%；汉文31篇，占13.96%；魏晋文6篇，占2.70%；唐文43篇，占19.37%；宋文共51篇，占22.97%；明文18篇，占8.11%。

⑤ 梅曾亮《古文词略》选唐宋八家文137篇，先秦两汉文104篇；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选秦汉文341篇，唐宋文272篇；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所收秦汉文比《古文辞类纂》多181篇，试图扭转其略于秦汉的选文思想；吴汝纶《古文读本》选先秦文97篇，唐宋八家文83篇；吴闿生《古文范》选先秦文60篇，唐宋八家文36篇。统计数据所据版本依次为：梅曾亮《古文词略》，同治六年（1867）合肥李氏20卷本；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26卷本；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光绪十六年（1890）金陵书局28卷本；吴汝纶《古文读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学校司铅印两册本；吴闿生《古文范》，民国十六年（1927）文学社两册本。他们认为此前的方氏选秦汉之作阙如，姚氏除唐宋八家外，明清两代选归、方、刘，不免自为一家之学，故有广收博取、开拓堂庑之意。

⑥ 蒋铭编：《古文汇钞》，吴伟业序，第2页a。

⑦ 周亮工编：《赖古堂文选》，康熙六年（1667）周栻园先生手定20卷本，徐芳序，第3页b—4页a。

⑧ 方苞编：《古文约选》，方苞序，第1页a。

述，卓然以古作者自命。……穆修表章韩学，欧阳公特师尊之，与梅圣俞、尹师鲁诸人共为古文，三苏、曾、王继起，而古文特盛。^①

夫古文自秦汉而下，至六朝而衰，至唐韩氏而一振，自唐至宋元明，其势日趋于薄。^②

其次，重心既立，其关联性也值得探究。晚明古文领域有秦汉、唐宋之争，唐顺之“未尝无法”的秦汉文法论与“有法为法”^③唐宋文法论又深入人心，清代选家接受这一看法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试图脱离论争窠臼，普遍以唐宋文为门径以上溯秦汉文。换言之，唐宋特别是八家之文使古文义法有迹可循，研读揣摩对写作古文而言是切实可行的：

唐宋八大家原本《史》《汉》以上诸书，学古而浸淫于古，梯航绝学，舍此安归，故又次之。^④

欲变世俗而使尽人之乐诵习《左》《国》、秦汉之文，亦必不如八大家之易入人。^⑤

由唐宋大家而《两汉》《左》《史》，溯流而上，先河后海之义也。^⑥

再次，如何理解秦汉、唐宋写作文法的差异与个性，一些古文选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孙琮言选文“意在返雅还醇，故一以唐宋大家为宗而上及于秦汉”^⑦，《山晓阁选古文全集》有“法”必评，使“法”切实可学，为二者不同的美学风格作出写作学上的具体诠释。在该集中，关键的字法评点11处，先秦文8处，汉文3处；句法25处，先秦文11处，汉文6处，唐文3处，宋文3处，元文2处；章法15处，先秦文3处，汉文2处，魏晋文1处，唐文3处，宋文5处，元文1处。字法即炼字，主要集中于秦汉文；句法是影响章法的因素，关系行文转折变化，唐宋文虽非无意于此，而句法锤炼多集中于秦汉文；章法则不同于字法、句法的局部经营，表现为整体的谋篇布局，唐宋文评点的章法最多。^⑧不难看出，从文法入手可以认知古文运动精神与秦汉、唐宋作品的写作之道——秦汉文更注重局部的字法、句法安排，因此呈现出凝练深邃、高古瘦硬的特征，而唐宋文更重视整体章法，炼字较少，故而容易形成通俗晓畅、一唱三叹的风格。此后，周焯《古文详注引蒙集》强调古文选本应该博采诸家，先秦文简古精粹，汉文雄大昌明，魏晋文壮丽典雅，唐宋文曲折排宕，而风格之差异是“段落转折”^⑨的文法不同所致，各代行文皆有长处，而秦汉文作为艺术极则，自然与唐宋文的学习殊途同归。

此外，一些选本还将唐宋文的影响顺延至明清。吴敏树评姚鼐《古文辞类纂》曰：“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⑩认为归有光、方苞延续唐宋八家文脉，刘大櫟继之以发扬桐城文章。萧穆评刘大櫟《唐宋八家文选》曰：“八家之外无文，而于韩门附李翱六首，苏门附晁补之二首；八家之后唯明归太仆有光，才力虽不逮古人，而稍得古人行文之意。”^⑪指出明代复兴唐宋文章的魁首实为归有光。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说秦汉以降迄于唐，其文寢衰，韩愈出而“上掩八代而继武于周”，欧阳修“举昌黎之绝绪振之时”，明代唐宋派与清代桐城派“深得八家所传之法”^⑫，亦是重申清代前贤所论。概言之，清代古文选本对古文发展有相对前代选本较为全面的看法，做到了有根源，明重点，示方法，求延续，既肯定唐宋八家古文成就，也上溯先秦两汉文，又将文章发展关键下接明代唐宋派与清代桐城派，已然标示出了古文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关键作家，赋予选本古文发展概览的性质，明确古文是一个不离于道、因时发展的动态概念。

① 潘大弼、倪承茂编：《古文约编》，潘大弼序，第1页a—1页b。

② 王壘编：《国朝文述》，王壘序，第1页a。

③ 唐顺之：《唐顺之集》上册，马美信、黄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6页。

④ 蒋铭编：《古文汇钞》，蒋铭选例，第11页a。

⑤ 姚靖编：《唐宋八大家偶辑》，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艺馆20卷本，姚靖序，第6页a—6页b。

⑥ 于光华编：《古文分编集评》，乾隆四十年（1775）务本堂4集本，秦鏞叙，第2页b—3页a。

⑦ 孙琮编：《山晓阁选明文全集》，康熙十六年（1677）24卷本，孙琮选例，第10页a。

⑧ 上述字法、句法、章法相关列述可参考张莹洁《康熙时期古文选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第115—125页。

⑨ 汪份、周焯编：《古文详注引蒙集》，康熙六十一年（1722）古吴焕文堂6卷本，周焯序，第4页a。

⑩ 吴敏树：《栟湖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⑪ 萧穆：《敬孚类稿》，项纯文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40页。

⑫ 杨彝珍编：《国朝古文正的》，光绪六年（1880）独山莫氏5卷本，杨彝珍序，第2页a。

三、诗文一理与骈散同源：古文的文体关系探索

清代以前，古文选本也有诗文合选、骈散兼收的现象，然而选家从文体角度对此现象的阐释较为不足。宋代文集序跋及笔记里虽出现了骈散一概论，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必大语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①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标榜“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②等，但因元祐学术复归，“周程、欧苏之裂”占据上风，道学家的轻薄艺文与古文家的文贯圣道之对立愈演愈烈，“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③对此，吕祖谦《宋文鉴》试图弥合文道之裂，恢复北宋文统，由于理学的自立门户与官方支持的缺失，严辨体制依旧是文学主流。至明代，破体选文在古文选本中较为常见，陈仁锡《古文奇赏》有大量魏晋六朝以及唐代的骈文，陈继儒《古文品外录》、方岳贡《历代古文国玮集》的“古文”目录中也包含此类文体，这是在新兴八股文冲击下对古文的大胆扩容，目的是迎合市场需求，毕竟在辨体意识极为强烈的明代，考察文体如何互通不可能成为选本的首要任务。步入清代，选本具有全面整理、总结前代创作经验与成就的性质，大古文观的选学格局应运而生，身兼道统、文统的选家认为内涵丰富之“道”不限于理学，“文”也有事辞相称、文质兼备的主张，选本实现由文到事、道文共存的功能转向。骈散论争的此起彼伏也使选家重视诗歌、骈文的价值，对典重、浑成、醇雅之作予以适当选录。在新的文化背景与学术理念作用下，清人打开了诗文一律、骈散合一的认知新境，而作为思想投影的古文选本自然也对此有渐次深入之论，不再死守文体壁垒与正变藩篱，出现了前代选本罕有的文体关系考索。

清代早期，古文选家关于诗歌、骈文与古文的关系认知开始萌芽。方苞说古文“与诗赋异道”^④，强调古文文体的纯净性。浦起龙又指出古代文章中含有诗歌，“《尚书》有‘飏言’‘五子’，《左》《史》诸书，具载歌谣，则文故足以统诗也”^⑤，诗文既是共生关系，那么古文选本也可选录古诗。文坛有陈维崧、尤侗、吴绮、毛奇龄、吴兆骞等名家积极创作骈文，而骈文选本数量寥寥，其势尚不足与古文并论。古文选本中骈散趋异与兼容骈散的论点并存，《古文渊鉴》录入叶适批语达120条，居历代评语撰者之首，可见面临文化遗产与重构时肯定弥合文道之裂的浙东学派，赓续经世精神。其他选本如《古文析义》《古文觉斯》《古文眉诠》《古文雅正》《唐宋八大家类选》皆兼收骈文或诗歌，以蔡世远《古文雅正》为例观之，该集选“雅正诸篇”^⑥，只说古文当理正辞雅，文质相得，未以骈散形式论断古文，四库馆臣对此论曰：

此集有李谔《论文体书》、张说《宋公遗爱碑颂》诸篇，似乎稍滥。不知散体之变骈体，犹古诗之变律诗，但当论其词义之是非，不必论其格律之今古。……兼收俚偶，正世远深明文章正变之故。^⑦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例言曰：

有韵之文，古人所勒诸金石、盘盂、几杖、户牖者，大都词奥旨深，与《诗》《书》相表里。秦汉而后，足观者鲜矣。数公所撰，未尽与古人抗行，然有可采者。曰箴，曰铭，曰哀辞，曰祭文，曰赋：为类五。^⑧

多数选家主张以作品思想为要，反对“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⑨，不遵循《古文约选》卑视骈文有如隶奴的体例，能客观地从文章发展视角看骈体有韵之作，因时制宜、有选择地收入选本中，这既是深明文章的发展规律，也是对文体创新与传承之间微妙平衡的精准把握。

乾嘉之际，汉学复兴浪潮使得骈文创作蔚然成风，骈文在文学体系内的定位有所改变，与古文并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刘友智校注，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45页。

② 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54页。

③ 吴子良：《笈窗续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④ 方苞：《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⑤ 浦起龙编：《古文眉诠》卷39，乾隆九年（1744）三吴书院79卷本，第24页b。

⑥ 蔡世远编：《古文雅正》，朱轼序，第2页a。

⑦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第1732页。

⑧ 储欣编：《唐宋八大家类选》，雍正元年（1723）受祉堂14卷本，储欣例言，第4页b。

⑨ 方苞编：《古文约选》，方苞序，第1页a。

立，古文选家明确提出诗文一理与骈散同源的论点，力求突破方苞洁净文体的选文框架。方苞《古文约选》对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编选有一定影响，前者所选基本都被后者收录，二者选文主体均是两汉与八家文，韩文和欧文占比最多，旨趣相通。不同的是，姚鼐认为“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①，诗与文固是一理而取径各异，在阳刚阴柔、道艺合一的根本属性上一致，其论辞赋之体性及选录标准曰：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②

肯定辞赋是风雅之变体，归诗歌于辞赋，重申诸体同源的理论，扩容古文选本的文体类别，已然打破了《古文约选》的文体畛域。骈文复兴并渐与古文方驾，创作上出现骈文八家，主张骈散同源，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写道：“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③他认为，扬散抑骈是尊乾卑坤，未能通晓文之源流，古之作者以文明道亦不讳于修辞。古文选本的观点与之类似，乾隆等编《御选唐宋文醇》序曰：

骈句固属文体之病，然若唐之魏郑公、陆宣公，其文亦多骈句，而辞达理诣，足为世用，则骈又奚病？^④

天地皆有化工之“文”，古代文章本无定形，重在言之所立而已，陆燿《切问斋文钞》例言也说文章形制“纷如聚讼”^⑤，选家应该举其卫道以成文者，立言贵在有用，骈俪文也有主旨、辞气皆不卑弱的，肯定文章不悖古文精神，显示出较为博大的文体观。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文学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于文体多样性的认可与尊重，是学术思想碰撞与融合的生动体现。

道咸时期，古文选本虽数量不多，但其中也有诗文一理说，鲜有骈散异趋论。随着汉宋学术交融的深化，选家没有截然舍弃骈俪文的观念，展现出奇偶互通、勇于创新的审美取向，古文特征的探讨与辨析进一步成熟。苏积功《苏选古文备要》序曰：

附古诗于末卷者，为曲终雅奏，成于乐之意也，皆所以备由下而高、由浅而深之要，明乎古今文风之盛衰，不使有歧途以害孔孟之学而已。^⑥

同时期选家也有相关文论，姚莹《复杨君论诗文书》：“诗之与文，尤无二道。”^⑦方东树推阐道：“古文及书、画、诗，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气骨间架体势之外，别有不可思议之妙”^⑧，用法、取境、气骨、间架、体势等精微处的相通是不同艺术趋近与互通的理论基础，此前姚鼐曾说诗文皆近道之技，“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⑨他们肯定诗文载道这一终极目标的一致性，诗、文之道与行己实为一体，皆是学道与格物的必要内容，合乎六经之旨，符合成己成德之功，这就解释清代古文选本为何多选文天祥《正气歌》、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长恨歌》之类的感时言志之作。选家对骈散二体也有阴阳相协、兼容并包的理念，蒋湘南《唐十二家文选序》曰：

奇只偶双，奇偶相间，律中宫商，物相杂，声成音，皆谓之文，盖犹规矩之于圆方。是以六经之语有奇有偶，文不窳而道大光也。^⑩

另外，姚椿《国朝文录》有《儒史廉吏辨》《制科取士之法考》《春秋时用人论》《春王正月辨》《秦蜀荆楚形势议》《三吴水利略》《学高辨》《太极论》《学术辨》《经论》等文章，意在明道经世，又认为“道与文而一之”^⑪；王夔《国朝文述》认为古文莫高于六经，学习古文当“沉潜其义，以其道存之于

① 姚鼐：《惜抱轩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35页。

② “纂”同“纂”，姚鼐编：《古文辞类纂》，黄鸣标点，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姚鼐序目，第21页。

③ 袁枚：《袁枚全集》，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8页。

④ 爱新觉罗·弘历选：《御选唐宋文醇》，允禄等编，乾隆序，第4页b—5页a。

⑤ 陆燿编：《切问斋文钞》，陆燿序，第2页a。

⑥ 苏积功编：《苏选古文备要》，道光二十七年（1847）苏氏20卷稿本，苏积功序，第1页b—2页a。

⑦ 姚莹：《东溟文集》（外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2页。

⑧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1，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⑨ 姚鼐：《惜抱轩全集》，第64页。

⑩ 蒋湘南编：《七经楼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541册，第345页。

⑪ 姚椿编：《国朝文录》，咸丰元年（1851）终南山馆82卷本，姚椿序，第1页b。

心，体之于身，施之于物”^①，道存于心，不反对文体中的骈俪成分。他们都充分肯定骈文的辞章之美与载道价值，从侧面反映出骈散相济、折衷义法之说深受拥戴。

同光以降，古文选家承续了前人诗文同源、骈散互通的文体观，认为它们皆是文章一体，意在体察内在神理的相通性。此时传统学术面临艰难处境，古文选本遥接宋学的实践导向与汉学的求真精神，旨在挽救风俗人心，力戒空谈外在形式。梅曾亮《古文词略》将“诗歌”作为古文一体，认为“诗至齐梁弱矣”，而对于古体诗与近体诗二者却又不是不分轩轻的：“子建、叔夜之文，未尝非古文也，然气则靡矣”^②，格律妨碍诗歌自如流转之气，不利于情感抒写，主要从精神气脉理解古文，已不是皮相之见。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有《诗》12首，秦汉、唐宋八大家等文与之并列，《古文四象》有《诗》80首，指出诗文俱本于六经，属同一谱系，意在反对“舍经而降以相求”。^③骈文方面，曾氏《经史百家杂钞》有六朝骈文91篇，其《鸣原堂论文》评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曰：

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④

自然之物多奇偶相生，学习古文自然需洞明骈散互用之道，骈文亦可兼义理与气势。有的选家兼辑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以六朝骈文为主，《古文读本》则以先秦散文为主，体现兼宗骈散的文章理念；王先谦有《续古文辞类纂》《国朝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等，批评中可见骈散互通论，“文章之理，本无殊致；奇偶之生，出于自然”^⑤，称清代骈文超越前代原因在于参义法于古文而一洗偶俪俗调，赞赏陆机《五等论》融古文疏宕之气于骈俪之文，体现出骈散互济的思想。清末民初，古文选本如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吴闿生《汉碑文范》等依然兼收各体，以为骈散融通更有益于古文写作。不难发现，清代随着诗与文、骈与散之关系讨论的深入，多数古文选本支持骈散同源、诗文一理，认为作品文义合用则无需像方苞《古文约选》一般避开骈文与诗歌，不同文体的精深微妙处原本相合，不墨守一体之规亦成清代选本编纂的主流趋向，古文选本的“古文”自然成为兼容骈俪、具有弹性的文体。

四、垂馨千祀不离“文”：古文的审美属性体认

清代古文选家以儒家经书为根柢于道的古文渊源与典范，确立文以明道、文从道出的纲领性主张，也指出作品垂馨千祀之关键亦在于美学价值，古文观念中的载道指向与审美追求并不矛盾。从表象看，明清古文选家都认为古文有着深固难徙的审美属性，实际二者关于古文审美属性既有评判视角的不同，也有学理深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代古文选本多崇尚个性，少数选家在批评个性解放思潮时才会追溯六经以求卫道，清代选家则用美学的眼光审视六经。譬如胡时化《名世文宗》“所选羽翼六经”^⑥，钟化民《文章正论序》言“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法文”，惟务“匡世道、挽人心、将正己”^⑦，至言无言、至文不文的六经理论无非是为了重振《文章正宗》明义理、切世用的纲领，反对荒经蔑古的世风，以六经教化功能为重而不及其美。清人也说文之源始于六经，同时也注意到它是非常好的文章才可恒久地承载道统，揭示了古文审美的固有性。清廷《古文渊鉴》是有清一代选家以六经为文之极则的典型，大力褒扬六经遗泽玉成之美文。一方面，评述西汉、唐宋古文有浓厚的宗经思想，欣赏守经持正之作，而宗经又不仅是宗法经之思想，也欣赏其美学风格：

辨而裁，雅而贍，渊然经术之风，不徒以侃正见长。篇中多引经语，不嫌冗杂，首尾相生，反覆照应。（刘向《条灾异封事》眉批）^⑧

① 王澐编：《国朝文述》，王澐序，第1页b。

② 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同治六年（1867）合肥李氏校刊24卷本，梅曾亮凡例，第1页a—1页b。

③ 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古书生标点，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序例，第1页。

④ 曾国藩编：《曾国藩全集·诗文》14，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16页。

⑤ 王先谦编：《骈文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王先谦序，第25页。

⑥ 胡时化编：《新刊名世文宗》，万历七年（1579）李充实刊30卷本，王锡爵序，第5页a。

⑦ 刘祜编：《文章正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钟化民序，第423页。

⑧ 爱新觉罗·玄烨选：《御选古文渊鉴》卷15，徐乾学等编，第1页a。

端正有体，中间禀经酌史，含风蕴雅，如睹三代以来法器。铺张骏烈，非此种不足以光金石。（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眉批）^①

元元本本经术之文。……经术之文，湛深博雅，读之令人起敬，曾南丰不得专于前。（魏了翁《赵钥夫宗藩文类序》眉批）^②

另一方面，论六朝文不赏其辞华，而是从其与经书关系的角度进行评判，对丽而有则之文章特致青眼，说明其源出于经，看到了文质彬彬、美善合一的六经美学对六朝文的促进作用：

骈偶之文，纬以经史，故丽而有则。（徐陵《奉使邺都上梁元帝表》眉批）^③

典质高华，亦复风姿掩映，自从经术中来。（邢邵《请建明堂太学疏》眉批）^④

上述点评对六经以思想化人、以文辞传世有明确意识，宗经理念之中蕴涵着文章审美风格学说，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也说“必溯源六经”^⑤才能清真古雅，也是说明与六经思想、风格一脉相承的作品更具耐久性，推崇六经的思想内容与文章美学。换言之，深于六经是评价审美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优秀古文辞理一体的审美风貌即导源于六经，所以，在认同“文本于经”的时代出现“六经皆文”的思想萌芽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在评价《文选》上，清代古文选家的视野更为融通客观，认为《文选》对古文选本审美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明代古文选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肯定《文选》的审美价值，遗憾其所收美文不够全面，例如尤瑛认为“萧氏之辑华矣，逸而未全”^⑥，钱士馨指出“不足尽绮藻骈枝，以剧魏晋之丽”^⑦；另一派则推崇《文章正宗》，批评《文选》无益道德教化，即谢朝宣所谓“徒志于文”^⑧，胡纘宗也说“萧统诸家所选主于英华”^⑨，不得纪言之意。清代古文选家跳出了或耽于辞采或只取经术的两派之争，转而在选本发展史中对《文选》进行价值定位。现存真正意义上的古文评点第一书当为吕祖谦《古文关键》，萧统《文选》则为文章选本，而清代选家有以《文选》为古文选本之祖者，如钱大镛《明文在》序曰：

私若以之能继《文选》实有余，何也？编次之法仿之，而有加焉。首赋，次诗，次骚，次七，次演连珠，次诏诰制册，次策问，次檄露布，次颂表箴启奏疏，次赞箴铭原议论辨说，次书序记碑铭墓志传行状，次录，次书事杂志，次冠词字词哀诔祭文，次公移，次题跋。^⑩

该集凡例又曰：

近时选家俱不分门类，学者无从知其体裁，是诚缺典。今各体俱参《文选》目录而稍增损之，以古文有选本自《文选》始也。但《文选》详于诗赋，而略于序记志状。是编略于诗赋，而详于序记志状。^⑪

钱大镛将《文选》的文体分类、编次理念移植于《明文在》，也指出二者的差异。毕竟古文选本应“略于诗赋”，以序、记、志、状等应用文为重，不同于《文选》的诗赋主导，而“略”不等于不选，注重审美而保留此类文体与《文选》影响有关。又如蒋铭《古文汇钞》凡例曰：

《昭明文选》而后，若真西山、谢叠山、杨用修、孙月峰、茅鹿门、张侗初、王凤洲、钟伯敬、陈明卿诸先生，研精评释，楷模后人，功非小补焉。……余得涉览纵观，启所不逮，损益去取，不无取衷焉。^⑫

① 爱新觉罗·玄烨选：《御选古文渊鉴》卷36，徐乾学等编，第13页a—13页b。

② 爱新觉罗·玄烨选：《御选古文渊鉴》卷64，徐乾学等编，第6页b—7页a。

③ 爱新觉罗·玄烨选：《御选古文渊鉴》卷26，徐乾学等编，第38页b。

④ 爱新觉罗·玄烨选：《御选古文渊鉴》卷28，徐乾学等编，第2页b。

⑤ 方苞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王同舟、李澜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⑥ 尤瑛编：《周秦两汉文选》，万历四十三年（1615）周子文刻12卷本，周子文序，第7页b。

⑦ 钱士馨、陆上澜编：《三国两晋南北朝文选》，崇祯十五年（1642）来复堂13卷本，钱士馨序，第1页b。

⑧ 谢朝宣编：《古文会选》，弘治十二年（1499）天一阁藏30卷本，谢朝宣序，第1页b。

⑨ 胡纘宗编：《秦汉文》，嘉靖二十二年（1543）程良锡刻8卷本，黄省曾序，第7页b。

⑩ 薛熙编：《明文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0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钱大镛序，第336页。

⑪ 薛熙编：《明文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08册，薛熙凡例，第337—338页。

⑫ 蒋铭编：《古文汇钞》，蒋铭选例，第13页a—13页b。

《古文汇钞》凡例将《文选》置于首位以彰显其对古文选本的影响力，并收录诗赋32篇。此外，谢有焯《古文赏音》选诗赋25篇，宋思仁叙曰：“选家之文苦于繁而乐于简，唐文曰《粹》，宋文曰《鉴》，明文曰《衡》，皆总删一朝之文而归之以约者，合《昭明》之简意也。”^①认为古文选本篇目精简、文体全备的体例得益于《文选》启发，有纠偏沉重与补充不足的开创意义。上述论断都确认了《文选》在古文选本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排斥文章发展中出现的优秀美文，肯定其编次与审美。

第三，明代古文选本评点以零散的眉批、旁批、注释等形式存在，难成体系，清代则注重提出批评术语，丰富了古文审美理论，如方苞《古文约选》的义法论，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八字诀，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的清雕琢说，都是文章审美的集中表述。此外，最具标志性的是清代选家开始探究古文意境美学：一是认为古文意境有别，曾国藩《古文四象》分文境为太阳气势、少阴情韵、少阳趣味、太阴识度四类，化抽象哲学概念为清晰的意境风格论。二是提出古文意境评判标准，吴闾生《古文范》评韩愈《与孟尚书书》：“盖学养既至，积厚流光，自然发露于不觉。”^②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评《城濮之战》曰：“一目了然，不至令人思索，此等文境，亦大不轻易走到。”^③指出好的作品绝无虚矫、惟真是美，形成重性情而兼涵养、尚自然而斥堆叠的批评观。三是分析古文意境与文法的联系。方宗诚《左传文法读本》评《楚侵随传》：“记熊率且比言作一折，伏后季梁谏之根。一转意境更深。”^④评《北戎伐齐传》：“插入故有郎之师及公之未昏于齐一段，文境乃突兀变化。”^⑤肯定文法的转折带来意境的变化，让古文意境的文法特征具体化。四是涉及意境本源，方苞《古文约选》评《论语辨》：“以意包笼，……苦心深造，忽然而得此境。”^⑥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评《愚溪诗序》：“‘愚’字生出意境，……不惟笔妙，亦属心灵。”^⑦说明文章意境是作者经过修养锻炼而形之于文本的境界，其本体融合了宋明理学的性情与道理学说。这些论述从有何类、藉何评、如何作、因何生的角度对意境论予以释要，是一种自成体系、考察深入的文章美学思想。如是观之，清代古文意境论的成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古文选本理论先声，表现出对古文之美深于明代的学理性体认与总结。

第四，清人肯定古文审美的固有属性，却也不是机械停留在理论层面，也试图付诸实际应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一传统源自艾南英《金正希稿序》的“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⑧，专就起承转合文法言之。清代统治者也确定“以古文为时文”的作文理念，“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⑨，认为明代不同时期时文宗尚各异，惟取法古文者才属“纯正”一派。清代古文选本常见类似观念，也对明人选本中低层次的文法模仿提出质疑，譬如吕葆中《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凡例批评明人古文评点使古法尽亡，清初黄宗羲、顾炎武批判举业湮没人才，选本为举业设自然被舆论唾弃，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指出茅坤选本“大抵为经义计”^⑩，认为时文写作应得古文精髓。总体来看，清代古文选本虽然也注重八比之法，但倾向深醇尔雅之作，强调学古通今，希望学子能写出有审美价值的文章。《古文约选》倡义法以反思成化、弘治时文内涵的不足，认为经史典籍根柢深厚才能文章有神，触处即发，气象高远。其后，姚鼐《古文辞类纂》被认为“鉴别精，品藻当，下语简，旨在启发人意，和评选时文的蹊径也不相同”^⑪，复现了《古文约选》的不落时文评点习气，跳出了惟以时文为务的窠臼。李云程受姚鼐影响，不拘泥明人学习古文的经史援引与行文

① 谢有焯编：《古文赏音》，宋思仁叙，第4页a。

② 吴闾生编：《古文范》，台北：中华书局，2019年，第140页。

③ 林纾编：《左孟庄骚精华录》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8页。

④ 方宗诚编：《春秋左传文法读本》，林庆彰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2编，第16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第40页。

⑤ 方宗诚编：《春秋左传文法读本》，林庆彰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2编，第16册，第42页。

⑥ 方苞编：《古文约选》，柳子厚文约选，第18页a—18页b。

⑦ 林纾编：《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慕容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⑧ 艾南英：《天慵子集》，道光十六年（1836）艾氏家塾刻3卷本，卷3，第116页a。

⑨ 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

⑩ 储欣编：《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卷首总序，第237页。

⑪ 钱仲联：《梦苕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9页。

逻辑,指出举业文章应融入古文神理,论时文“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①清人追求入乎文法之内又出乎文法之外的美感,未有时文不通而能通古文的观点也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着不可忽视的选本史价值。

五、清代古文选本古文观念重构的批评史意义

清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重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批评史意义。首先,清人使提倡儒学、修习古道的理念重回古文创作与编选中,一改明代无益世教政治之习气,还古文以重道之精神面貌。文以明道、文从道出的观念并非清代古文选家所独有,前人对此已多有论述:韩愈自道,学古道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②;柳宗元有言,“文者以明道”^③;苏轼认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④;朱熹也总结说,文皆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⑤遵循传统儒家文艺思想的清代古文选家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对文道关系也提出要求,或论文以明道,或言文从道出,非空谈道源文流之类的滥调陈说,切实指出何种文章为有道,说明道与人的修养也密切联系,使古文本体有了应用性的发展。这些理念放在明中叶以来险怪艰深、骋辞空疏的创作背景下看,不乏开启文风嬗变的积极意义。自韩柳古文运动以来,古文往往被赋予合乎孔孟道统与发扬先秦两汉文统的双重意蕴,而清人的法随义生强调古文传达宋儒载道之说以重塑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讲求结构、修辞。合道不只是作文准则,也成为选家的选文准则,传布推广清真雅正、温柔敦厚的文风。换言之,只有到清代古文选家这里,古文核心精神充分结合编选实践,重回道统成为了这一时期人所共知、深入本质的古文选本编选理念与具有普及意义的批评话语。

其次,清代古文选家论述古文起源与发展关键,明确选文重心,反映出由唐宋溯源秦汉以至六经的文章统序,对古文发展脉络有所总结与创获,修正了明代古文选家对古文发展的消极认知。从选文看,清代选家最重先秦两汉与唐宋文,魏晋文较少,基本不录元文,结合其副文本的相关论述,可知其普遍认同古文始于先秦、盛于秦汉与唐宋、变于魏晋、衰落于元的古文发展纲要,总体遵从文本于经的论断。选家在指出古文源流甚远,在韩柳古文运动之前,古文就已存在于先秦经籍之中,有实无名,而古文之盛衰非全因时代之升降,关键在于是否有能自树立、起衰救弊的豪杰之士。韩柳古文运动使古文名实兼备,“唐代古文的有韩柳,犹之先秦儒家的有孟荀”^⑥,对古文地位的确立与重振儒道与文统有积极作用。古文源流的考镜体现出清代选家遴选历代佳作的大古文观,追求文之精神层面的精纯古雅,完成选本追求由张扬个性向有益于世、通观各代的转换。相对于宋人选文时代有限与明人推崇秦汉或唐宋之偏颇及其副文本论述的不足,清代古文选本选评精审,对古文脉络的诠释与阐说较为清晰完备,表现出古文史观后出转精的发展趋势。清代古文选家通过编选实践与文章评论概述前代选本较为薄弱的古文发展史内容,矫正明代前后七子之弊,调和对秦汉派、唐宋派争端,构成了选本编选理念演进的关键一环。

再次,清代古文选本的文体观念通达,认为古文之核心要义在言之有物,而非恪守形制要求,在文用实践与骈散关系认知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更新发展。清代古文选本选录对象的身份多为史家、古文家、道学家、名臣,崇实学、明理义、襄文治、勸后学、利举业是选家的主要目的,倾向于可表现出古文义法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古雅实用之文,热门选本几乎都有“教后人”^⑦、“正蒙养而裨后学”^⑧、“备童蒙之诵习”^⑨等迎合市场需求的卖点,选评作品时往往运用时文写作思路,譬如《古文约选》只录散文,严守文体之纯净,旨在求古文义法以触类而通,为制举敷陈论策则有余裕,而《古文觉斯》《古文析义》《古文渊鉴》《古文观止》《古文眉诠》等绝大多数古文选本以论辩、奏议、书说、史传等以散文为主,亦兼及诗歌、辞赋、骈文类的有韵之文。清代选家不仅从八股文写作角度强

① 李扶九选编:《古文笔法百篇》,黄仁甫纂定,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李元度序,第1页。

②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57页。

③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2页。

④ 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6页。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19页。

⑥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42页。

⑦ 过珙编:《详订古文觉斯》,过珙序,第7页a。

⑧ 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康熙三十四年(1695)映雪堂12卷本,吴兴祚序,第2页a。

⑨ 谢有焯编:《古文赏音》,谢有焯序,第3页a。

调兼收各体、转益博览的重要性，也在古文载道思想的统摄下反思古文选本的选文时代重心与文体倾向，并揭示古文中韵文、骈体成分的不可避免。他们一是强调务本，即以六经、孔孟之作为要；二是重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的精于义法；三是肯定唐宋古文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有效汲取。这三者无一不是追求古文精神而不拘形制，肯定各体文的创作经验与价值。选家在不同时期对古文与诗歌、骈文之关系有不同程度的认识，由各角度阐释对诗文一理与骈散同源的文体思索，指出骈散二体始终处于相互抑制而又相互沟通的关系中，各体文的精妙处绝无相悖，不拘骈散、兼容诗赋终成古文选本常例。

最后，清代古文选家充分欣赏文章之美，反对作文害道，这是在反思和批判明人文道分离之后的必然走向，揭示古文美善俱备、质文合一的审美固有性。他们以六经为典范，肯定其至高无上地位，认为审美性是文章垂馨千祀的重要原因，用六经思想与风格作为选文、衡文准则。虽是编选古文选本，但是也充分尊重《文选》这种骈俪文选本，认为《文选》开创了选集重视诗赋的编纂传统，说明清代选家受其影响而兼容诗赋、取其体例者不在少数。而其在古文审美理论方面的贡献也比较突出，我们知道，清代古文选本的理论术语较多，这是前代选本难以媲美的，对古文之美的探究也比较深入，使古文鉴赏与创作有了可依凭的准则，促使古文美学理论的繁荣。宋代以后的道学家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常常标举义理，而六朝开启的重文倾向作为文章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隐传统”也不期然而然地导致多数古文家不至纯以意识形态选文、作文。清代古文选家文道互彰的识见是促进选本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赋予了古文选本兼收并蓄的特点，于修身、齐家、治国的意识形态之外强调意到笔随、浑灏流转的为文最高境界，不否认文以载道的重要性，同时主张有审美价值的古文，从而将古文选本与质木无文的学术著作、理学语录划清界限，古文观念也不陷于思想论的牢笼中。

六、结语

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使清初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时期”^①，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最后的历史阶段，文化、文学、学术自然被赋予了集大成的属性。古文选本与时代风会紧密相关，受定于一尊的理学思想影响，有别于宋代的选文视域有限，也不同于明代公安派、竟陵派独抒性灵、反对拟古的自由主义色彩与官方对文章审美功能的抑制，显示出集古大成、典雅醇正之风貌。相应的，清人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也呈现出守正与融通兼备的特质。所谓古文观念的守正，即是批判明末选风的浇漓，强调古文核心要素蕴含儒家思想的概念与范畴，复归于道，认同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提倡道统精神是其应有之义，体现了道德与文学的紧密连接。在这个前提下通观、描述古文发展史，指出古文是因时而变、代代更新的存在，特别是秦汉散文与唐宋古文运动的写作实践虽风格、文法各异，合于道统且不乏佳作，构成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并臻的古文美学顶峰，是应被推崇取法的古文典范。除此之外，清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也不乏融通性。一方面，清代古文选家剔除了明人古文选本的严格辨体倾向，判断一个作品是否能入选古文选本不乏主观性，认为古文的关键在于神而不在于形，通过理论的形式肯定骈与散、诗与文的互通性，拓展了古文选本选文的体制空间，追求文义合而非专注行文形式，因此在选本中纳入了一部分情感深挚、思理绵密的骈俪诗文。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古文的审美属性是固有的，从对六经与《文选》的艺术评价与体例借鉴中可见这一传统，并且多有理论、实践并重的诠释，把经世致用的载道思想与辞章相融合，灵活处理体用二者间的关系。总而言之，清人对古文选本为何而选的论说更为全面，对前人博杂无依与偏执一隅的古文观念起到很好的反拨作用，选本的学理性、审美性、实用性也随之提升，反映出文用实践与理论认知的深化，完成了古文观念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责任编辑：潘纯琳）

^① 孟伟：《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第16页。